

试论公共施粥所在奥斯曼慈善救济中的作用

杨 瑾

内容提要 公共施粥所是奥斯曼人为践行伊斯兰教悠久的慈善救济理念而创制的新机构。这种机构以大型的皇室瓦克夫为核心,覆盖到几乎帝国所有的地区,在帝国各地的救助网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探讨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时空分布、类别、救助对象与方式、规模,揭示出该体制与帝国征服和建设步伐的动态关系,以及穆斯林统治精英如何将宗教义务和责任与缓解社会贫困问题、稳定等级秩序、加强政权合法化紧密结合起来的历史创举,并强调该体制对近代早期中东济贫近代化改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奥斯曼 公共施粥所 慈善救济

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并发展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的过程中,伊斯兰教起着凝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基层组织——穆斯林城镇与社区的形成与发展方面。穆斯林社团的伦理思想与价值体系最集中地表现在瓦克夫(*waqf*,穆斯林个人为虔诚目的而捐献的宗教基金会)制度所支撑与提升的《古兰经》福利观念,即保证所有穆斯林的基本生活需要,且通过普及瓦克夫支持的公共施粥所体制(*Imaret*,音译“伊玛莱特”),将伊斯兰施舍义务与帝国核心意识形态直接联系起来,在缓解因贫富分化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等级秩序、实现财富重新分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在西方兴起的“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新社会史学派影响下,一些国外学者开始研究伊斯兰历史上的贫困与慈善救济问题。奥斯曼以公共施粥所为代表的慈善救助观念和实践,便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关于奥斯曼公共施粥所已经有了不少深入的研究,但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开始。笔者尝试以瓦克夫捐献文件为基础,探析遍及帝国各地的公共施粥所如何继承发展了穆斯林的慈善救助理念与实践,特别是大型皇室公共施粥所在奥斯曼济贫实践中的作用。

一、公共施粥所

“公共施粥所”一词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新创造的词语,英文著述多译作 *public kitchen*, *poor kitchen* 或 *soup kitchen*,直译为“公共厨房”、“穷人厨房”或“汤厨房”。笔者根据其功能意译为公共施粥

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分别代表包括施粥所在在内的整个瓦克夫建筑群和单独的公共施粥所机构。前者包括清真寺——宗教学院——公共施粥所——苏菲道堂——医院——陵墓在内的大型综合建筑群。这种个人捐献的纯奥斯曼风格建筑群落是其在征服地区统治的标志以及建设新城镇的基础。后者指每天专为捐献者指定的“值得救助的”、“需要救济的”和贫穷的人准备和分发饭菜的公共施粥所。¹ 它们是安那托利亚、中东和穆斯林史料中最独特的机构,也是综合建筑群最吸引人的部分。一年四季专为客人提供饭菜,在服务范围和内容上已大大超出伊斯兰传统的三天免费招待和周五晚上、耐麦丹和节日期间的固定施舍。因此,现代土耳其语词典和部分学者主张采用狭义用法,如最早研究伊斯坦布尔市政机构的学者奥斯曼·N. 埃尔金。历史学家伊纳尔塞克等学者认为,伊玛莱可根据具体情况或宽泛或具体。但大多数学者选用广义用法,本文亦不例外。

从本质上讲,施粥所属瓦克夫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所谓瓦克夫是指穆斯林为虔诚敬主而将部分全权财产用益权转化为基金会形式,财产本身及其收益用于捐献者指定的对象。² 它以个人为真主奉献财富而换取来世回报为特征,是伊斯兰独特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支撑着穆斯林的教育和公共福利体系。辛格教授称之为伊斯兰世界历史上体现主动施舍和慈善实践最有力的、正式的载体。”施粥所是单独建筑 and 管理的瓦克夫机构或附属大型瓦克夫综合建筑,主要功能为煮饭和分发饭菜;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煮饭设施——厨房、烤炉、储藏室及饭厅;工作人员——经理、厨师、面饼师傅及其助手、淘米工、磨面工、洗碗工、库房和配餐室保管员、护工和看门人,有的还指定或雇佣一名屠夫或磨房工。标准食谱是每天两顿粥和面饼。粥的主料为大米或小麦粉,根据财力、季节和地方口味加入肉、脂肪、酸奶、蔬菜和调料等。有的还给新来旅客提供糖果和蜂蜜等营养品。周四晚上和宗教节庆日还特意准备羊肉炖米饭和用藏红花与蜂蜜烹制的甜米饭,阿舒拉节用谷物、豆子、鹰嘴豆、干果和水果干等准备丰盛的传统布丁饭。

施粥所如何起源与演变的,象征意义如何蕴涵在早期仪式中,如何穿越时空影响后世等问题尚有争议。但史家根据文献记载,倾向于认为它是奥斯曼人的创造,因为伊斯兰建筑史料未曾提及,且奥斯曼之前的中东很少见到每天公开给很多人分发煮熟食物的现象。特拉维夫大学教授艾米·辛格认为:“一年四季每天从专门为此设计的特殊建筑中给城镇居民中的很多人分发煮熟的饭菜似乎是奥斯曼的发明,至少在麦加、麦地那和希伯伦等圣城。大型施粥所被冠以不同名称,成为奥斯曼定居、殖民化、政权合法化和城镇发展计划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根据文献记载,奥斯曼最早的施粥所是1336年奥尔汉加齐(1324—1359年)在伊兹尼克捐献的一座公共施粥所。而此前的帝国创始人奥斯曼(1258—1326年, O sm ½n G ½zē 又拼为 O sm anli)“每天亲自支起饭桌,招待穷人和孤儿。……他极度

¹ E.W. 莱恩主编:《阿拉伯语—英语词典》(E.W. Lane ed., *Arabic English Dictionary*),伦敦:1863年版。

² 按照受益对象大致分三类:公共瓦克夫、私人瓦克夫和混合瓦克夫。捐献者先制定详细的捐献文件(*vaḥfīye*),由卡迪签名,录入法庭登记册,确保瓦克夫自从捐献之日起,财产权永远归真主所有,收益永远归慈善目标——公共服务或机构。瓦克夫在财政和管理上形成独立的实体,创办人对财产具有绝对处置权,如制定收益目标和管理形式,指定监管人、信托人和管理员。信托人和管理员(经理)负责瓦克夫所有事务,确保实现捐献人的预定目标。监管人负责考察主要官员和员工是否称职,并通过卡迪或特派员审查瓦克夫的账目,保证机构继续履行其既定功能。

³ A. 辛格:《构建奥斯曼仁慈:耶路撒冷一座皇室施粥所》(Amy Singer, *Constructing Ottoman Beneficence An Imperial Soup Kitchen in Jerusalem*),纽约:2002年版,第295页。

满足的事情是给穷人衣服穿和饭吃”¹。从奥尔汗加齐亲自点燃伊兹尼克公共施粥所灶火起,为穷人煮饭便带有极强的象征性。此后,这种服务于广大“穷人”的慈善机构随着奥斯曼殖民步伐的加快,数量不断增加,遍布帝国境内的军事、政治、宗教和文化重镇,成为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标志。15世纪编年史学家阿西克帕萨扎德在《奥斯曼人历史》中清楚表明,公共施粥所在奥斯曼由偏隅安那托利亚西北的一个小公国发展到横跨欧亚非大帝国的过程中,始终是奥斯曼帝国建筑风格的代表。15世末,征服者穆罕默德统治末期开始隐退,但仍每天按时给所有到宫里来的人分发食物。苏丹不再亲自分发食物后,施粥所高耸的大烟囱给所有人昭示素丹的恩惠。因此,供养穷人的每个行为都充满与奥斯曼国家相联系的象征主义。奥斯曼统治者及其家人建造的施粥所,把供养穷人每个行为所蕴涵的象征性进一步延伸、强化。施粥所和分配食物的仪式代表了苏丹采取的以对穷人广施恩惠的手段,旨在加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忠诚纽带。

至17世纪奥斯曼旅行家埃弗里亚·切勒比时代,这种特殊的奥斯曼机构已遍及帝国土地——安那托利亚、巴尔干地区和阿拉伯各省。“我,埃弗里亚,这个卑微之人,已经旅行了51年,足迹踏遍18个统治者的疆土,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能比得上我们这令人羡慕的、无与伦比的机构。……从前,素丹的施粥所一年四季,每天两次连续不断地、慷慨给穷人、赤贫者、年轻的年老的及旅行者一块面饼和一碗粥,一直到现在”²。

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奥斯曼公共施粥所的产生与伊斯兰中东特殊的慈善传统有关,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多种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特别是土库曼(1378—1468年曾建立黑羊王朝和1378—1508年的白羊王朝)一蒙古、穆斯林和拜占庭的慈善传统,以及奥斯曼素丹新的统治需要和治国理想的结合。斯蒂尔曼认为,中世纪伊斯兰地区沿袭着《古兰经》施舍理念与救助实践,存在着一些固定或临时的食物救助机构,“医院、神学院和道堂也施舍食物,但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似乎没有任何类似于奥斯曼土耳其皇室清真寺毗邻恢弘的公共施粥所那样的机构”³。大量史料表明,古代波斯、拜占庭、穆斯林和土库曼一蒙古都有各种救助穷人的设施和场所,特别是伊斯兰地区的苏菲道堂、客栈、驿站、宗教学院、坟墓、大户人家等都给穷人分发食物(面饼、汤、粥或节庆和圣日套餐),有的每天接待数千人。而塞拉柱人的商栈厨房(免费为客人提供三天食宿,为动物提供畜棚和饲料),则被称为奥斯曼公共施粥所的主要原型。此外,哈里发纳绥尔·丁在首都巴格达设立的粥棚、蒙古统治者合赞可汗及宰相拉希德·丁等统治阶层成员,在首都塔布里兹捐建的大型瓦克夫综合建筑(包括清真寺、神学院、苏菲道堂、医院、图书馆、浴室、水榭、公共施粥所、孤儿学校),以及希伯伦著名的亚伯拉罕穷人饭桌等,也对奥斯曼施粥所产生了一定影响。⁴

¹ J. 马修:《书评》(Joyce Hedda Matthews “Book Reviews”),《美国历史回顾》(*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3年10月,第1256页。

² A. 辛格:《构建奥斯曼仁慈:耶路撒冷一座皇室施粥所》,第152—158页。

³ M. 邦纳:《〈古兰经〉的贫困与经济学》(Michael Bonner “Poverty and Economics in the Qur’an”),《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25卷,2005年第3期。

⁴ S. A. 阿尔卓曼德:《近代之前伊斯兰世界慈善、法律和公共政策》(Said Amir Arjomand “Philanthropy, the Law,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Islamic World before the Modern Era”), W. 艾尔车曼、S. 卡兹和 A. 昆恩主编:《世界传统中的慈善》(Warren F. Ickham Stanley N. Katz and Edward L. Queen, ed., *Philanthropy in the World's Traditions*),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1—122页; A. 萨巴拉:《中世纪伊斯兰贫困与慈善:马穆鲁克埃及, 1250—1258》(Adam Sabra *Poverty and Charity in Medieval Islam: Mamluk Egypt, 1250—1517*),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92页。

二、公共施粥所的时空范围和类别

辛格教授认为,公共施粥所是随着奥斯曼人崛起而遍及帝国各地,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具有以下特点:从空间上看,主要集中于帝国早期统治地区,即塞里姆一世征服以前的多瑙河之南和幼发拉底河之西,从安那托利亚向东数量逐渐减少,内陆多于沿海,沿交通线路分布。一般城镇都有一个,重要城镇则比较集中。例如,布尔萨 21个、埃迪尔内 11个、伊斯坦布尔 30个、伊兹尼克 6个、阿马西亚 9个、塔布里兹 4个、迪亚巴克尔 6个、马尼萨 6个、贝尔格莱德 5个、于斯屈普 5个;埃及、伊拉克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省份以及多瑙河以北和高加索的藩属地区较少出现,但应该有供养学生、教师、官员、旅行者和贫穷者的替代机构。施粥所的空间分布有时也与个人偏好或偶然因素有关。例如,安那托利亚中北部偏僻的艾布达尔哈桑村,也有巴耶济德二世捐献的公共施粥所综合建筑(苏丹专为治愈公主迪尔塞兹哑病的圣人艾布达尔哈桑捐建的)。从时间上看,14—17世纪为公共施粥所的建设高峰时期,很多施粥所建于16世纪中晚期,显然是为了提高皇室权威、加快居民城镇化和定居化以及商业贸易发展(奥斯曼人继承了塞尔柱前辈在安那托利亚建立的旅馆或商栈网络,为旅行者和商人提供食宿),特别是在广大阿拉伯省份和伊斯兰教圣地。16世纪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施粥所的造型和功能逐渐固定下来,与法律典范规范化、新审美风格固定化一起,成为列入圣品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建造速度减慢,但仍出现一些著名建筑,如卡帕里·卡尔赛附近的努若斯曼尼耶、拜雅兹特和阿克萨里之间的拉莱里、埃于普的米赫里时,以及内夫谢希尔的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等复合建筑(1726年)。1820—1821年,在卡瓦拉建成的马哈迈德·阿里帕夏大寺应是帝国灭亡前建造的最后一批大型综合建筑。19世纪,坦兹马特改革大潮中的瓦克夫管理改革,奥斯曼统治阶层财富的转移,建筑和慈善形式和品位的改变,福利服务逐渐集中到新形成的政府代理手中,以及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济贫院等新福利机构的出现,施粥所逐渐停建。

至17世纪埃弗里亚时代,随着帝国扩张的顺利进行,经济贸易逐渐恢复,奥斯曼已在帝国内初步建立起施粥所体系,不仅为往来商旅、游学学者和学生、迁职的官员、朝觐者提供食宿之便,而且救济各类穷人。很多像埃弗里亚一样的宗教学者和旅行者在所到之处,都是主要依靠救助机构或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救济,才得以完成旅行。为表达对施主的感激和对帝国福利制度的赞扬,他将旅途中所遇到或吃过饭的施粥所及很多代(准)施粥所的施舍机构逐一记录在《旅行记》中(共200多个),并将它们分为四类。

(1) 皇宫附属的施粥所。由苏丹个人出资,在皇宫专辟厨房,为皇室成员及服务人员、旅行者、客人和进宫领薪水土兵,以及为穷人和“需要之人”准备并分发食物或食材。最典型的是买哈麦德二世的托普卡皮宫。“新宫殿将最大的仁慈慷慨地赐予每个人。一年四季优先给陌生人、穷人和病弱施舍丰富的食物,每天早、中、晚都给富人和穷人、上层和普通人每人供应三顿饭菜”¹。

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艾尔图格认为,15—19世纪斯坦布尔的老皇宫、耶尔迪兹宫、杜尔玛巴彻宫和查拉甘宫以及埃迪尔内的皇宫,在财政预算中都预留出施舍穷人和“需要之人”的食物或津贴。皇宫厨房提供的食物救助有三类。第一,分发购买食材的现金。穆罕默德二世统治后,皇宫厨房的账册

¹ A. 辛格:《构建奥斯曼仁慈:耶路撒冷一座皇室施粥所》,第153页。

除了记录素丹的私人捐献外,还有其他救助穷人的开支。例如,1469年账簿记录着配餐库的负责人每周一、周四和周五亲自给穷人散钱,数量分别为250、250、1000阿克切。而宰尔海彻宫每月用于慈善救济的总费用达6000阿克切。最大一笔开支是1489年2月2日—1490年1月22日,巴耶济德二世统治期间每月施舍给聚集在皇宫门前的穷人的钱,共计2000(每年24000)阿克切。第二,准备饭菜的基本原材料(肉、米、面饼和柴火)。皇室厨房负责人决定准备施舍的食材量,按天或月分发。厨房还规定每天要给偶然出现在皇宫的其他“需要之人”施舍食材。穷人们在皇室厨房慷慨行为的鼓励下,纷纷提交救济申请。1799年妇女德米霍思向皇宫管理局申请救助。她在申请书中说,自己丧偶后,一大家人便生活不下去。她要求每天补贴她家4乌克耶(约等于1阿克切)的脂肪、3乌克耶大米、4乌克耶羊肉和3塞克的柴火。她的申请得到批准。另一名贫穷妇女塔赫莉的申请也得到批准。第三,煮好的饭菜。艾尔图格认为,“(皇宫)为旅行者和周边居民提供食物施粥所。通常提供4种饭菜:肉菜烩米饭、肉食、面饼、与藏红花一起烹煮的米饭布丁,肉菜烩米饭还搭配一块熟肉。在特殊日子里,还提供大米、欧芹和肉等材料一起煮成的粥、加蜂蜜的巴卡拉瓦饭菜,食谱上还有核桃等食料。皇宫厨房准备的饭菜质量总比宫外施粥所煮的饭菜好很多。19世纪很多回忆录和皇宫账簿都称赞皇宫发放食物种类繁多和质量之高。因此,皇宫厨房一直救助穷人,充当奥斯曼帝国最大的施粥所,供养着人数众多的各色人等,正如分散在皇城和帝国其他城镇的施粥所一样”¹。1574年皇宫厨房给上访群众和穷人准备饭菜需要166只羊和155凯勒大米。16世纪的皇室厨房档案中,将给穷人施舍的饭菜或现金列为加里亚(gayriya),共100份饭菜、100块肉、100块面饼、1凯勒大米、1只羊和60块面饼。此外,厨房还用饭桶、大壶和大盘子给住在皇宫周围的人送饭。17世纪初,麦哈迈德四世的皇宫厨房用粥和面饼供养着400—500人,其中有些是官差,有些就是来吃饭的人。19世纪皇宫厨房开始给附近的穷人送去煮好的饭菜。16、19世纪两份档案记录这项食物的救助范围很广。有些人看到皇宫施舍的食物如此慷慨,为了节约钱便不在家里煮饭,有的甚至搬到皇宫附近居住。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8年)统治期间,皇室厨房开始缩减这项巨大开支,并减少送食物的人数。²

(2)大型皇家施粥所。素丹除了在皇宫施舍各类人群外,还与其他皇室成员一起在都城及其他重要城镇建造附属清真寺综合建筑或独立的施粥所,为当地各种值得救助的人和流动人员免费提供食物。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皇室施粥所主要有法蒂赫施粥所、巴耶济德二世施粥所、塞里姆一世施粥所、艾哈迈德一世施粥所、苏莱曼一世施粥所、塞赫扎德施粥所、胡蕾皇后施粥所、薇法皇后施粥所、埃于普施粥所、查汉吉尔王子施粥所、米赫里玛赫公主施粥所,以及阿提克和科塞姆皇后分别在乌斯屈达尔捐献的施粥所。苏莱曼大帝还在都城附近及巴尔干、安那托利亚、麦加、麦地那、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等地捐献瓦克夫,他在伊斯坦布尔至少建造4个公共施粥所,分别附属苏莱曼尼耶、胡蕾皇后清真寺、塞里米耶和塞赫扎德·穆罕默德综合建筑。他的宠妃古尔菲姆捐献的综合建筑也包括一所施粥所。1600年后仍新建很多施粥所。例如,素丹阿赫迈德在伊斯坦布尔建造的施粥所和努若斯曼尼耶综合建筑中的施粥所。17、18世纪,伊斯坦布尔再新添4座大型施粥所,分别隶属于艾

¹ A. 艾尔图格:《作为伊玛莱特的奥斯曼皇室施粥所》(Aeynep Tarim Ertug “The Ottoman Imperial Kitchens as Inarets”), N. 埃尔金、C. 纽曼和 A. 辛格主编:《供养人民、供养力量:奥斯曼帝国的伊玛莱特》(Nina Ergin, Christoph K. Neumann, Amy Singer eds., *Feeding People Feeding Power: Inarets in the Ottoman Empire*), 伊斯坦布尔:2007年版,第241页。

² A. 艾尔图格:《作为伊玛莱特的奥斯曼皇室施粥所》,第255—256页; B. 坦曼:《奥斯曼苏菲道堂厨房作为苏菲建筑伊玛莱特的反映》, N. 埃尔金、C. 纽曼和 A. 辛格主编:《供养人民、供养力量:奥斯曼帝国的伊玛莱特》,第212页。

赫迈德在梅达尼的综合建筑、耶尼·卡米新清真寺、马哈穆德一世的努若斯曼尼耶和穆斯塔法三世的拉莱里综合建筑。此外,还有埃于普·卡迈和穆拉德三世的母亲努尔芭努素丹娜的施粥所,以及大维齐和其他高级显贵建造的清真寺综合建筑附属机构。例如,马哈穆德帕夏、穆拉德帕夏、达乌德帕夏、科加·穆斯塔法帕夏、阿提克·阿里帕夏、阿加塞·侯赛因·阿加、卡拉·阿赫迈德帕夏等。卡西姆帕夏在加拉塔有捐建的独立施粥所,古尔妃姆哈吞(苏莱曼大帝的奶娘)在乌斯屈达尔建立的施粥所。

(3)苏菲道堂。奥斯曼很早就与苏菲主义有密切联系,历代苏丹都大力扶植苏菲主义的发展,斥巨资在全国各地捐献苏菲道堂。由于苏菲本身与贫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菲道堂是瓦克夫受益单位,也是救助机构。例如,设有免费给穷人做饭的厨房,是奥斯曼济贫体系中独特而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在救助穷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巴哈·坦曼认为:“拥有大量穷人的人口众多的伊斯坦布尔的施粥所数量相对有限,是因为数量众多的道堂厨房供养着很多僧俗穷人,如首都和托法奈的卡迪里派遣堂每天两顿摆起 12张供 12人坐的低矮桌子,每顿共招待 144人吃饭。”¹

(4)大户人家的厨房。随着聚居地不断壮大,在没有施粥所和数量或接待能力不足的地方,大户人家也和公共施粥所一样慷慨招待旅行者,特别是在行省地区,如迪亚巴克省东北的比特里斯。“舍瑞夫·哈姆、哈吞尼耶和胡斯瑞夫帕夏的施粥厨房从前办得红红火火,给所有旅行者和访客供应营养品,但现在他们的瓦克夫江河日下,只能在阿舒拉和莱麦丹斋月期间晚上供应汤粥,实际上它们可有可无,因为很多人家院门大开,像公共宴会厅一样招待过往行人。”²拉伦德地区显贵的大门总是敞开着,每时每刻地欢迎旅行者。斯莱布赖尼卡·萨赫因帕夏家族自征服者穆罕默德时代起就一直招待所有旅行者。“在旅客还没有解开他们的麻布口袋、包和水壶的时候,服务员就按照吩咐将他们的饭菜送到客房。他们也给送饭的人一些东西表示心意。陆地和海上的所有旅行者都知道这个好客的旅馆。”直至今日,麦弗拉那·卡麦镇的公共施粥所(14世纪早期由塞尔柱大维齐萨赫卜·阿塔之子艾哈迈德贝伊建造)一年四季每天仍向周围的穷人和旅客发放饭菜。耐麦丹节期间无法接待拥挤的人群,当地居民敞开家门招待客人。”

三、施粥所的慈善救助功能与影响

史料显示,奥斯曼施粥所提供的食物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早上米粥和晚上麦粥与面饼搭配,粥的内容丰富度与制作精细度根据创办人的财富和地位、选址及负责人和员工能力不同而有所区别。瓦克夫文件严格规定吃饭的人、吃什么、吃多少、食物在哪分发、在哪吃、以怎样顺序吃等细节,由公共施粥所具体执行,根据情况不断完善与修正。由于瓦克夫档案材料主要体现创办人的虔诚与慷慨,对于从施粥所接受施舍食物的人只是粗略地按类划分。因此,我们只能大致了解到前来吃饭的

¹ B. 坦曼:《奥斯曼苏菲道堂厨房作为苏菲建筑伊玛莱特的反映》(Baha Tauman “Kitchens of the Ottoman Tekkes as Reflections of the Imarets in Sufi Architecture”), N. 埃尔金、C. 纽曼和 A. 辛格主编:《供养人民、供养力量:奥斯曼帝国的伊玛莱特》,第 212 页。

² A. 辛格:《服务于奥斯曼慈善:奥斯曼公共施粥所》(Amy Singer “Serving up Ottoman Charity, The Ottoman Public Kitchen”),《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 25 卷,2005 年第 3 期,第 151 页。

³ C. 纽曼:《论奥斯曼伊玛莱特的象征主义》(Christoph K. Neumann “Remarks on the Symbolism of Ottoman Imarets”), N. 埃尔金、C. 纽曼和 A. 辛格主编:《供养人民、供养力量:奥斯曼帝国的伊玛莱特》,第 281 页。

人身份多样,而不仅仅是穷人。下文比较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尼耶、法蒂赫和耶路撒冷的胡蕾施粥所食谱和食客构成,分析其救济的对象、方式、救济的规模以及在缓解贫困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瓦克夫自 8、9 世纪四大教学法派产生起就被纳入伊斯兰教法范围,教法学家对创建与运行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法律规定。而奥斯曼政府为便于管理瓦克夫而存录的大量档案材料,为我们观察施粥所救济对象提供了珍贵资料。笔者在比较都城与行省施粥所的施益对象时,发现两者的不同。1659 年,伊斯坦布尔苏莱曼尼耶食物接受者登记表和“尊贵清真寺员工中间的食物接受者登记表”中,记录的饭菜总数为 580 份。其中清真寺员工 29 名,每天可得到 32 份饭菜(宣礼师和首席书吏两三份饭菜,其余员工每人每天一餐饭;《古兰经》诵读师 10 名,每人每天一餐饭);2 个道堂的员工(额芬迪道堂 5 份饭菜和 10 块大面饼,哈希姆·切勒比道堂 15 名员工 15 份饭菜,与道堂相联系的其他 5 人每人一份饭菜);年轻的、未经过训练的奴隶们 15 名,每人每天一顿饭。而伊斯坦布尔麦哈迈德二世施粥所瓦克夫登记册的食物接受者登记表中,“伊斯坦布尔小王子素丹麦哈迈德汗王施粥所食物接受者”,包括“年轻的、未经训练的奴隶”25 人(大多数得到一餐饭,其份额后来转给他人)、338 名男女(有权享用 403 份饭菜,每人一餐饭,个别除外)、67 名享受半份饭菜者(总共 42 份)。该登记册中只有极少数受益人有称谓,暗示他们大多数人来自普通老百姓,可能属物质匮乏的贫者。1589 年,苏莱曼施粥所支付给瓦克夫员工的食物与津贴总数为每月 282 餐饭,14865 阿克切,耐麦丹月支出 25635 阿克切。其中包括 6 所神学院学生和员工 111 人(耐麦丹月每人 105 阿克切,其他月份 60 阿克切)、清真寺员工(宣教师一餐饭,50 阿克切;周五聚礼宣教师塞姆赛丁两餐饭,60 阿克切,总共 23 份。耐麦丹月每餐饭 90 阿克切,其他月份为 6 餐饭共 60 阿克切。穆安津 23 人共 23 餐饭,在耐麦丹月每餐 90 阿克切,其他月份每餐 50 阿克切。”1619 年,伊斯坦布尔巴耶济德二世瓦克夫现金代替食物领取者登记册中,包括 68 名男子,每人每月 70 阿克切。85 名男子,每人每月 60 阿克切。33 名男子,每人每月 40 阿克切。66 名妇女,每人每月 70 阿克切。136 名妇女,每人每月 60 阿克切。57 名妇女,每人每月 50 阿克切。其他 3 人,总人数达 448 人,共支付 316 320 阿克切。1658—1659 年,布尔萨城新切勒比素丹麦哈迈德汗清真寺瓦克夫和皇室施粥所面饼接受者名单中,包括神学院学生,每天 120 块面饼。其中,大伊玛目 6 块面饼,周围居民 87 户,每户一块面饼(很多是寡妇,及拥有额芬迪、贝伊、戴德、哈塞等头衔者)。1659 年 9 月 10 日,布尔萨穆拉德二世施粥“饭菜分配和面饼接受者登记表”中,包括宗教学院雇员 4 名,雇员 55 块面饼、教授 40 块面饼、15 名学生 60 块面饼(每人 4 块)。清真寺雇员 14 名 74 块面饼、施粥所埃米尔办公室 56 人 399 块面饼、4 名学徒每人 6 块面饼、3 所宗教学院 40 块、基金会工作人员(包括穆特维利、书吏、督管)6 块面饼、附近男女居民 757 块面饼(艾尔—哈切、额芬迪、贝伊、塞赫和赛义德,但似乎主要由普通人组成)、附近妇女 75 人 235 块面饼,以及其他后加的 32 名男子 120 块面饼。

上述记录说明,在施粥所吃饭或领取食物(现金或食材)的人身份多样,包括瓦克夫工作人员、各种教职人员、苏菲、附近居民(男女)、旅行者和穷人。很多受益人拥有赛义德、额芬迪、艾尔—哈切和卡乌斯头衔,属“值得救济的人”。这体现伊斯兰特有的贫困与救济观念,也说明宗教人员在获得济贫资源方面的优先地位。至于在施粥所吃饭的资格如何获得?具体操作过程如何?这些问题尚不清楚,但档案材料证实受益人是通过瓦克夫穆特维利和皇室认证获得领取食物资格。1659 年,布尔萨的穆罕默德·切勒比瓦克夫文件中,有“按照 1647 年法律文件,清真寺伊玛目阿里额芬迪获得每天 8 块面饼。1659 年 9 月 10 日其资格获得皇室证明。迈赫迈德的儿子穆斯塔法切勒比每天 6 块面

饼, 4块是按照 1654年易卜拉欣阿加颁发的证明书要求分配的, 2块是迈哈默德阿加 1659年颁发的证明书及 1659年 9月 10日一份皇室证明书要求的。……哈费兹·迈哈默德额芬迪每天 4块面饼, 是 1652年管理者阿卜杜拉卡迪尔阿加签发的管理员证明书和 1659年 9月 10日的一份皇室证明书所要求的。穆斯塔法·奥格鲁·赛以赫·优素福每天 3块面饼, 是 1659年管理员阿加的证明书要求的。”¹ 佩里教授认为, 18世纪耶路撒冷胡蕾施粥所吃饭资格证最初由基金会穆特维利签署, 后来大军事长官、省督、地方法官及其副理、穆特维利副理或代理等都有权签署, 局面一度失控, 中央政府最后决定吃饭者必须持有皇室财政署证明书。² 迈赫迈德切勒比瓦克夫面饼接受者登记册规定: “圣城会计署会计哈桑额芬迪: 你须在会计署妥善保管该登记册以备瓦克夫需要。从现在起, 没有黑人大太监同意, 你不可以登记为一个新受益人来填补空缺。即使瓦克夫管理员在布尔萨法官、帕夏和监管人要求下签署一份证书, 你无论如何都不可登记, 所有证书必须经黑人大太监批准, 才可以登记。你应万分小心, 不可违抗命令, 于 1659年 9月 10日。”³ 凯汉·奥尔贝教授从大量档案材料中, 发现吃饭资格可以继承、转让。“给迈米的儿子萨班(一餐)饭菜, 1642年 4月 1日顶阿卜杜拉空缺。1674年 1月 18日上述萨班去世, 马赫迈德切勒比顶替他的位置。1676年 3月 1日, 马赫迈德切勒比自愿放弃(一餐饭的权力), 拉赫梅哈吞顶替他的位置。1679年 2月 8日, 拉赫梅哈吞去世, 胡赛因的儿子雅库布顶替她的位置。”⁴ 说明这份吃饭资格在 36年中数次易手。“1622年 11月 1日给赛义德·哈桑儿子赛义德·加法尔饭菜一顿。1622年 7月 15日, 赛米莱哈吞放弃吃饭的权力, 将其转让给上述赛义德·加法尔。(赛义德因此有两份吃饭的权力) 1682年 5月 8日, 赛义德·加法尔去世, 他的两餐饭权力分别转给阿卜杜拉的女儿拉比亚和自己女儿哈瓦(6月 13日)。后来哈瓦自愿放弃所继承的吃饭权力, 1684年 2月 13日阿卜杜拉的儿子穆斯塔法顶替她的位置。”

可见, 获得吃饭权力是基于与机构的联系, 并非所有希望得到食物的人都能得到食物, 贫穷者并非施粥所最多的食客。而施粥所是按照证书分发食物的, 证书又可以转让(一般由受益者本人或通过瓦克夫管理者转让给其他人)。很多施粥所档案材料证实持证书者往往超出最初规定人数, 管理者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例如, 苏莱曼尼耶瓦克夫文件规定给 738个固定员工、200名客人每天提供饭菜, 但登记册中有 1136人。1659年, 施粥所给 300名员工和学生分发饭菜, 人数低于瓦克夫文件规定的 738名员工和学生, 于是, 瓦克夫管理者便增加了 836名男女受益人, 后者成为每天施饭数量最多的人。

施粥所根据受益人身份而有区别地提供不同数量和质量的食品, 安排不同的吃饭顺序和地点, 刻意规范施主的慈善活动, 并强化等级秩序。法蒂赫提供的标准餐为: 早餐米粥和晚餐麦粥, 辅料有肉、盐、欧芹、洋葱、欧莳萝、胡椒、鹰嘴豆、倭瓜、酸葡萄或酸奶及苕苕菜等, 每天烘烤发放 3300块面饼。每逢周五晚上供应典型的豪华餐(节日饭菜、宴席), 包括多道饭菜, 特别是肉和甜品(甜粥、肉菜烩饭、羊肉炖米饭、用蜂蜜和藏红花腌制的米饭, 以及带无花果、梅李、葡萄干和杏仁的水果布丁)。

¹ N. 埃尔金、C. 纽曼和 A. 辛格主编:《供养人民、供养力量: 奥斯曼帝国的伊玛莱特》第 187页。

² O. 佩里:《瓦克夫与奥斯曼福利: 18世纪耶路撒冷哈塞克苏丹苏丹娜穷人施粥所》(Oded Peri “Waqf and Othman Welfare: The Poor Kitchen of Haseki Sultan in Eighteenth-Century Jerusalem”),《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 35卷, 1992年第 2期。

³ K. 奥尔贝:《分配食物、面饼和现金》第 188页。

⁴ K. 奥尔贝:《分配食物、面饼和现金》第 177—178页。

耐买丹节期间晚上供应一顿节日饭菜。苏莱曼尼耶早饭是用精炼黄油、鹰嘴豆、洋葱、盐、倭瓜、酸奶、柠檬、胡椒等辅料烹煮而成的米粥,晚饭是用精炼黄油、鹰嘴豆、洋葱、盐和枯茗做成的小麦粥,两餐饭都配有面饼。每逢节庆日还有更丰盛的羊肉米饭和藏红花蜂蜜米饭等节日大餐。耶路撒冷胡蕾施粥所早餐为大米和精炼黄油、鹰嘴豆、洋葱、盐、倭瓜、酸奶、柠檬、胡椒等辅料烹煮而成的米粥,晚饭是用精炼黄油、鹰嘴豆、洋葱、盐和枯茗做成的碎麦粥。两餐饭都配有长条面饼。

在接待量方面,法蒂赫每天两次为 1500 多人提供饭菜,食客包括前来参观或公干的显贵、旅行者、清真寺里高级宗教学院的学者和学生、看门人和护卫人员、附近其他 3 个学院和 4 个当地托钵僧道堂的学生、600 名在校学生及 8 个学监、65 名公共厨房工作人员 47 名救济院工作人员以及包括清真寺和陵墓杂役在内 51 名其他服务人员。苏莱曼尼耶的接待量不明确,比法蒂赫少,但比胡蕾耶路撒冷施粥所多。后者每天为 500 人提供两顿饭,其中员工 50 人,400 人来自“贫困和遭遇不幸的、孱弱的和不能自足者”,每人在那里吃相同的粥和面饼,对员工和旅行者明确规定供给大份。

每个施粥所的吃饭顺序与发放食物数量相对应,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优先高贵客人。在法蒂赫,贵客先吃,然后是塞曼宗教学院的师生、其他学校的师生、厨房员工,最后才是穷人。在苏莱曼尼耶,有知识的人先吃。在耶路撒冷,人们轮流吃饭。厨房和清真寺雇员先吃,55 个房客次之,接着是服务员(杂役、仆人),最后是穷人。在饭菜质量方面,高级客人四人一桌用餐。每天都能吃到羊肉米饭、藏红花蜂蜜米饭及肉炖梅李和水果,其他人每周才能享用一次这样的饭菜。更高贵的客人,如先知后裔的早餐,能享受到超级美味的羊腿、南瓜、蜂蜜、果酱、肉桂、丁香烹制的菜肴,还有大份肉和米饭。瓦克夫最高负责人每天三餐饭,高级员工两顿饭,低级员工一顿饭。一般客人和常客(学生、员工和穷人)之间也有类似差别。在饭菜数量方面,厨房员工每餐饭可得到一勺粥、两块面饼。学监和老师两勺肉、两勺粥。大多数员工、学院学生和学者,每人一份粥和一块面饼。苏菲僧和人数最多的穷人每餐饭是半勺粥,一块面饼。每逢周五,每人都会享用到节日圣餐和一块肉。两个穷人分吃一块肉。在附近小学上学的孤儿和贫困儿童和穷人一样吃两顿饭,两个孩子分一碗粥、一份肉和两块面饼。在吃饭地点上,一般要求在施粥所餐厅吃饭,严格限制将饭菜带出施粥所。但是,学者、先知后裔中的穷人、瞎子、瘫痪者和病人的饭菜可以由他人代领。

每个施粥所供养的人口也因所在城镇的行政级别、经济状况和人口构成(本地学生或苏菲社团规模)而出现明显差异。例如,哈塞·哈桑宰德施粥所每天给 15 名法蒂赫宗教学院学生和 7 名在附近小学上学的孤儿和厨子,每人每天一碗粥和两块面饼,总花费为 21 阿克切。而大马士革的穆拉德·切勒比客栈在 4 个月的朝觐期间,每周两次向旅客供应羊肉米饭和藏红花蜂蜜米饭。¹ 施粥所的地区差异、食客构成的多样化(既有宗教机构服务人员、旅行者、学生,也有各类穷人)和饭菜数量与质量的差别,说明奥斯曼施粥所济贫很少是基于纯经济层面的长久机制,也无意消除贫富差别,而是通过食物施舍建立与巩固现存的等级秩序,努力将社会各个阶层都纳入帝国福利系统,使之更符合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需要,并试图在全国建立另一种共享文化机构的尝试。K. 纽曼认为公共施粥所提供食物的统一性、场所和受益者等级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风雅、得体”的行为规范,服务于巩固奥斯曼社会秩序之想象,其象征性使奥斯曼慈善成为皇室合法化的、被接受的有效手段,包含着补偿

¹ N. 埃尔金、C. 纽曼和 A. 辛格主编:《供养人民、供养力量:奥斯曼帝国的伊玛莱特》第 241—249 页。

(报酬)机制而非施舍给予,形成了强调皇家慈善的伊斯兰公共福利观念。¹

但遍及帝国各地的施粥所在供养城镇人口、救助弱势群体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例如,法蒂赫每天分发的饭菜超过 12 500份,其中给大众施舍 11 500份饭菜,还有等量的面饼。当时,伊斯坦布尔的 15万居民(皇宫居民和军事阶层除外)中,约有 15%的人口可以得到食物(按照 16世纪初面饼市场价格,一份价值 1阿克切的饭菜包括 400克肉和约 500克面饼,能提供 2500卡路里热量,可以满足每天最基本营养需要)。而其他地区的公共施粥所则供养着城市 10%左右的人口。²至 1859年,伊斯坦布尔仍有 15所伊玛莱特在运行。1911年春天,土耳其政府下令解散部分施粥所。但是,政府参与救济穷人公共体制并非完全取代施粥所,特别是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度困难时期。因此,法蒂赫、苏莱曼尼耶、努若斯曼尼耶和阿提克瓦利德施粥所在关闭三年后,又允许重新运行。20世纪后期,伊斯坦布尔 6所和安那托利亚周围其他城市的 21所伊玛莱特都在开放。可见,施粥所在解决都城和地方重镇基本需要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总之,由伊斯兰传统慈善伦理和救济实践所支撑的施粥所体制,在保障大量流动人口和贫弱人群的基本生存方面起着持续而巨大的重要作用。奥斯曼素丹通过控制食物来履行作为虔诚穆斯林个人的宗教施舍义务,同时,彰显其政治权力和军事能力以及对臣民温饱问题的责任。因此,施粥所并非纯粹的济贫机构。它提供的热粥和面饼不仅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也具有特别明显的象征性,暗含着施者与受者之间的义务与权利及庇荫关系。

[本文作者杨瑾,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西安 710061]

(责任编辑:马新民)

¹ C. 纽曼:《论奥斯曼伊玛莱特的象征主义》,第 286页。

² S. 阿尔卓曼德:《近代之前伊斯兰世界慈善、法律和公共政策》,第 125页。

A transatlantic worl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 the Madeira wine trade declined dreadfully. Transatlantic interactions were actually the basic impetus for bot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adeira wine.

Yang Jin, *Ottoman Public Kitchens and Their Roles in the Network of Relief for the Poor*

The public kitchen, 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Ottomans as a new institution embodying the age-old ideas of Islamic charity and poor relief,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network of the Ottoman poor relief. This institution, with its wide coverage throughout the empire, centered around the imperial Waqf.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times, its categories, its beneficiaries, its means of relief and its scal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imperial conquest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s through which the Muslim elites combined the religious obligation and duties of charity with reduction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social order and with the legitimization of the regim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institution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 upo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lief for the poor in the Middle East.

Jiang Ya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Witchcraft Prosec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Witchcraft prosecution on a large scale was a prominent and ridiculous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ome historians hold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aze for witchcraft prosec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sovereign stat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facts of England that the author has explored,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truth. In fa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England did not intend to stimulate or provoke the craze for witchcraft prosecution, but rather, to a large extent, supervised and controlled witchcraft in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order. This on the contrary prevented unlimited expansion of witchcraft prosecution to some extent.